

# “然而，甘迪是完全与众不同的。”

文|阿兰达蒂·罗伊

译|未央

每个认识甘迪的人都会如此说道。这也是几乎所有走进她的生活的人的共识。甘迪由于疟疾，在 2008 年 4 月 12 日上午于孟买医院去世，而疟疾可能是在恰尔肯德邦的丛林中感染的，在这里，她一直教授由一群阿迪瓦西（是南亚大陆土著人民的统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始部落而闻名。根据 2011 年的人口普查，阿迪瓦西占印度人口的 8.6%，即 1.04 亿人。——译者注）妇女组成的学习班。在我们组成的这一“伟大”的“民主政治体”中，甘迪是所谓的“毛派恐怖分子”，很容易被逮捕，或者更可能在一次伪造的“遭遇战”中被射杀，就如同数以百计的她的同事所经历过的一样。当这个“恐怖分子”发高烧，去医院进行血液测试时，她只能给救治她的医生一个化名和一个无用的电话号码。也因此，医生没有途径去通知，医学检验查验到了她的致命性的恶性疟原虫疟疾。阿努拉达的器官一个接一个的衰竭，而等到她 4 月 11 号住院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出于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原因，我们永远的失去了她。

阿努拉达同志享年 54 岁。人生中的大半时间（超过 30 年）她都是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地下党而工作着。

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与阿努拉达·甘迪见过面。但在我参加她的追悼会的时候，我却可以断言，她最终不仅仅是被众人深深的敬佩，也是被众人深爱着的一个人。我有一些迷惑于认识她的人常提起的她的“牺牲”，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她牺牲了安全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转身投入了激进的政治斗争。在我看来，甘迪是那种甘于处于单调乏味、平庸的生活状态专心追求梦想的人。她的生活艰苦而充实，令人向往。

阿努拉达和许多她的同龄人一样，在年轻时曾受到西孟加拉邦纳萨尔派起义的启示。作为一名埃尔芬斯通学院的学生，上世纪 70 年代蔓延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的大饥荒，给予了她难以磨灭的印象。正是与极度饥饿的受害群众一同工作，让她开始思考，并促使她踏上了激进政治的征途。她在孟买威尔逊学院 (Wilson College) 当讲师，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到 1982 年，她搬到了纳格浦尔。接下来的几年中，她一直在纳格浦尔、钱德拉布尔、阿姆劳蒂、贾巴尔普尔和亚瓦特马尔等地组织穷人中最穷的人——建筑工人、煤矿工人——这极大

的加深了她对于“达利特”（印度的没有种姓的贱民，被上等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运动的认识。20 世纪 90 年代末，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她还是坚持去了巴斯塔尔并与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一起住在丹达卡冉亚（Dandakaranya）森林里三年。在这里，她致力于扩张壮大非凡的“阿迪瓦西妇女革命组织（KAMS）”；其拥有超过 90,000 名成员，也许是印度最大的女权主义组织。阿迪瓦西妇女革命组织（KAMS）可能是印度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阿努拉达总是说她生命中最充实的岁月是她在丹达卡冉亚地区，与人民战争（即人民战争集团，印共毛前身之一）的游击队员度过的这些年。当我在阿努拉达去世近两年后访问该地区时，我对阿迪瓦西妇女革命组织感到敬畏和兴奋，不得不重新思考了一些关于妇女和武装斗争的简单假设。在这个系列的一篇文章中，阿努拉达用化名“阿万蒂”写道：

临近 3 月 8 日，新世纪初期的印度妇女阵线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和平原深处，在安得拉邦的落后村庄以及该邦部落的山丘中，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森林和平原上，妇女们正积极组织起来，打破封建父权制的束缚，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印度农村妇女解放运动，是受到革命号召的受压迫农民发动人民战争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妇女聚集在数百个村庄庆祝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沿着那拉洋浦（Narayanpur）这样的小镇的街道游行，反对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他们正带着孩子们穿过太舍（Tehsil）城镇和落后的巴斯塔尔（Bastar）市场村庄，要求为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

她们通过封路以抗议强奸案，并要求警方下禁酒令。

数百名年轻女性正在成为“达利特”的军队中的游击战士，摆脱了“传统”（即种姓制度。一译者注）赠与她们的奴工桎梏。迷彩服，橄榄绿帽子上的红星，肩膀上的步枪，这些充满信心的年轻女性把对封建父权制和对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印度的统治阶级的斗争相结合，用军事思想武装自己，以对付第三大的隶属于剥削者的军队。这是印度农村贫困妇女中最贫穷的妇女所觉醒的社会和政治意识。这些事迹远离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闪光灯，完全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媒体关注。她们参与的伟大的革命斗争预示着农村贫困人口生活的转变。

然而，这场革命性的妇女运动并不是一夜之间涌现的，也不仅仅是出于宣传而自发出现。妇女运动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而发展。与普遍看法相反，20 世纪 80

年代初，共产党革命力量在全国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封建压迫的激进斗争，使农民妇女有信心大量参与斗争，然后站立起来，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受压迫的贫穷的农民和佃农妇女中最受压迫的妇女，她们曾经不仅没有身份、地位和声音，甚至没有名字，现在则已经成为村里妇女组织和游击队战士的积极分子。随着武装斗争的增长，妇女的动员和妇女组织也在增长，导致这一革命性的妇女运动的出现，这是当今印度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妇女运动之一。但它不被承认，并且刻意被忽视，因为这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只要可以，就会试图压制任何新闻和承认的声音。

她对丹达卡冉亚的妇女运动的强烈热情并没有让她对女性同志在革命运动中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在她去世的时候，这就是她正在努力的方法——如何清除毛主义者中残余的妇女歧视思想以及革命的男同志顽固坚持的各种潜移默化的父权制思想。在我和人民解放游击军一起在巴斯塔尔度过的那段时间里，许多同志以如此动人的影响记住了她。

“雅娜琪同志”（Comrade Janaki，是甘迪的化名之一。一译者注）是他们认识她的名字。他们带着磨损的旧照片，照片里，站在森林里满脸疲惫的甘迪带着她标志性的框眼镜，肩膀上挎着一支步枪，眼睛却闪着希望的光芒。无论是阿努，亦或是阿万蒂、雅娜琪，她现在已经走了。她的离去使同志们的心中留下一一种可能永远无法克服的失落感，但她还留下了这一堆文件，这些著作，笔记和短文。我深感自己肩负的任务，那便是向更广泛的读者介绍它们。

要如何去阅读这些著作，就是一个问题了。

显然，这些著作并不是抱着汇集出版的目的去撰写的。初读之时，不禁让人觉得过于基础而多重复，营养很少。但再读、三读之后，却使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我现在把这些东西看作为阿努拉达对她自己的笔记。这些语言的详略，让她的各种论断像手榴弹一样从页面上爆炸，更显其独创性。

通读这些（文章）之后，你将瞥到一个，本可以成为严肃的学者，但却因看到身边的可怕不公正而无法作壁上观的行动者的思想。这些著作显现了一个尽其所能将理论与实践，行动与思想结合起来的人。当她决定为她所居住的国家和她所居住的人以及她所生活的人做一些真实而紧迫的事情之后，阿努拉达试图通过这些著作告诉我们（和她自己）为什么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活动家或者激进女权主义者，或生态女权主义者或 Ambedkarite。为了做到这一点，

她带领我们对这些运动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指引，通过缩略图快速分析各种意识形态，挑出他们的先进性和不足，如教师用荧光笔批改学生作业。这些见解和观察有时会被误解为简单的口号，但往往它们是深刻的，偶尔可以被顿悟的——而且只能来自具有及其敏锐的政治头脑，并且从观察和经验中深刻了解，而不仅仅来自历史和社会学教科书去认识她的研究项目的人。

也许阿努拉达·甘迪在她的著作中以及她所实践的政治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她在性别和达利特问题上的工作。她尖锐批评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种姓的解释（“种姓就是阶级”），认为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思想上偷懒。

她指出，她自己的党过去犯了错误，无法正确理解种姓问题。她批评达利特运动变成了一场身份斗争，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在从本质上就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寻求正义是徒劳的。她认为，如果不颠覆父权制和种姓制度，从根本上令其毁灭，就不会有新的民主革命。

在她关于种姓和性别的著作中，阿努拉达·甘迪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事无巨细，反对本本主义，敢于实事求是地讲——她的同志以及她一生所反对的制度。她就是这样一个人。